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5.06.010

论《拍卖第49批》中的网络想象

蒋怡

(江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苏 无锡 214122)

摘要:托马斯·品钦的小说《拍卖第49批》通过想象不同的网络形态,辩证地呈现了网络结构中蕴含的内在张力。小说将大众媒介、资本帝国与古老的邮政系统并置与关联,揭示出网络化控制并非新生事物,而是贯穿现代历史、不断演化的权力逻辑。与此同时,它也捕捉到网络的反控制潜能:以“特里斯特罗”为象征的边缘群体利用官方网络的缝隙,开辟出寄生其上或隐匿其中的“反网络”。小说对网络控制与反控制的辩证探讨,不仅彰显了品钦在互联网时代来临前对网络复杂性的前瞻性思考,也为我们理解当代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提供了深刻的见解。

关键词:网络;托马斯·品钦;《拍卖第49批》;大众媒介;控制社会

中图分类号:I7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5)06-0089-06

在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 1937—)的“南加州三部曲”中,《拍卖第49批》(*The Crying of Lot 49*)占据着一个尤为独特的位置。相较于《葡萄园》(*Vineland*)和《性本恶》(*Inherent Vice*)的回溯性和反思视角,它是唯一一部具有“前瞻性”(forward-looking)的作品^①,不仅精准地捕捉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社会骚动不安、颠覆能量暗涌的时代氛围,更揭示了当时美国的共识文化(consensus culture)正处于即将发生变化临界点上的现状^②,预示了彻底变革的可能性。小说对另类沟通网络、信息系统以及从主流文化中“秘密退出”等主题的探索,直指未来数字社会的核心文化基因。

近年来,学界日益关注《拍卖第49批》与网络文化的内在关联。学者们普遍承认品钦对网络技术的惊人洞见。例如,戈切诺尔(Phillip Gochenour)将小说中的“特里斯特罗”系统阐释为一种积极且具有解放性的“分布式社群”^③;伦托(Stephen C. Lento)则从“虚拟协作”的角度切入,视其为一种由底层构建、反抗权威的集体组织形式,其理念与早期互联网的缔造者们不谋而合^④。然而,若仅仅将品钦的想象局限于对某种特定未来网络的“预言”,则可能遮蔽了其思想的深度与复杂性。本文认为,《拍卖第49批》并非简单预言了某种网络形态,而是构想了一个包含多种网络模式的复杂生态系统。在此系统中,网络化控制作为一种贯穿现代历史的权力模式始终存在,而抵抗则是在此背景下演化出的复杂生存策略。因此,小说通过想象多种不同的网络形态,真正揭示的是内在于网络结构的控制与反控制的辩证张力。

一、网络控制:从大众媒介到资本帝国

在《拍卖第49批》中,网络是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意象,渗透于小到人物名字和身份、大到技术环境和叙事进程的每一个层面。主人公奥狄芭的姓氏“马斯”(Maas)在南非荷兰语中的意思即为“网络”

收稿日期:2025-08-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年度项目(24CWW036)

作者简介:蒋怡(1985—),女,江苏无锡人,博士,副教授,主要从事现当代英美文学研究。

①Dalsgaard I H, Herman L, McHale B.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Pynch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p. 30.

②Dalsgaard I H, Herman L, McHale B.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Pynchon*.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p. 30.

③Gochenour P. “Anarchist Miracles: Distributed Communities, Nodal Subjects and *The Crying of Lot 49*”, *Pynchon Notes*, 2003, 52-53: 40-52.

④Chorier-Fryd B., Chamerois G. *Thomas Pynchon*. Montpellier: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la Méditerranée, 2013, p. 64.

(web/net)^①,这与她在故事中为前男友尹维拉雷蒂整理遗产的行为——“将散乱的信息组织和联系起来”^②——形成了呼应。小说开篇,奥狄芭在观赏巴罗的三联画时,对画中刺绣姑娘的处境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同:刺绣姑娘“一针一针地绣着罩毯,毯子从间隙似的狭小窗眼里溢出去……这毯子就是世界”^③。奥狄芭恍然发觉,自己身处的地方又何尝不是“几千里外她在自己塔里织成(woven together)的毛毯”呢^④。奥狄芭既是编织者,又是被困于织物中的被编织者,这一反身性的悖论既隐晦又精准地传达出她在日常生活中被无形力量束缚的心理困境。

20世纪60年代南加州饱和的大众媒介环境,就是将奥狄芭困住的现实之网。小说细致地描绘了媒介技术如何以其庸常性产生无处不在的控制效应,搅扰着奥狄芭的寻常居家生活:电视机的“绿眼睛”不停地盯着她,电话不分昼夜地叮铃作响,广播无时无刻不在低吟。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说,所谓大众媒介(mass media)“显示的并非受众的规模,而是人人同时参与的事实”^⑤,无数民众利用电子媒介实现感统意识的延伸,同时也沉浸在人造图像和仿真符号构成的虚幻场景中。但技术共鸣场的体验并没有让奥狄芭感受到自我延伸的狂喜,相反,她对自己沦为技术网络上一个被动的节点感到无比焦虑。小说的叙事着重刻画媒介技术消解主体的暴力,电话机“一下子尖叫起来”,“仿佛是晴天霹雳”,引起奥狄芭“心惊肉跳的恐怖”^⑥和近乎神经官能症的发作;广播对信息进行类型化与量化处理时抹除个性特征,“你是一根天线,一夜间就把你的类型传送给千百万人,他们也就是你”^⑦。

电视机更是充当了执行这一时期大众媒介技术控制逻辑的核心载体。它混淆现实与拟象,侵入人物的梦境,促使个体思维与电视符号深度融合。奥狄芭的律师朋友罗斯曼将电视角色佩里·梅森视为真实的职业对手,执着地撰写剧本攻击和诋毁他;养老院里的索斯先生在电视机前打盹,动画片中的胖猪就直接进入了他的梦境;奥狄芭与梅兹杰边观看旧电影边玩“美人卸妆”游戏,他们的互动完全被电视影像所中介,银幕内外的界限最终消弭于无形。在品钦的笔下,大众媒介不再是传递信息的中立载体,而成为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批判的发达工业社会用以维护现有秩序、塑造“单向度的人”的统治工具^⑧。作为一种广泛普及的商品和服务,电视实则是社会控制的一环,人们看似自由地选择观看电视节目,实际上是在接受社会强加的需求和观念。在长期接受电视话语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丧失对事件的理解分析能力”,失去独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⑨。这种控制的恐怖之处在于其匿名性:权力网络并非由某个特定主体掌控,这给奥狄芭带来了“对手不知身在何处但又似乎无处不在”的偏执式恐慌,让她深深地陷于被隐形的权力所控制的担忧和“个体能动性明显丧失的强烈焦虑感”中^⑩。奥狄芭急切地想要逃离,但大众媒介如同天网般无处不在。

在小说中,媒介技术化身为去人性化的控制新形式,它们以“匿名与非人化的方式运作”,并且规模大到人们无从把握^⑪。媒介理论家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和萨克(Eugene Thacker)曾将网络形

①英语里表示“网络”的词,通常有 network, net, web, meshwork, 等等。Web 更容易让人联想到自然界中有机的网状结构,比如蜘蛛网、植物根系,它们的结构是自发形成的,通常没有明显的中心和边界;而 net 和 network 更多地用于描述人工构建的网络系统,如电网、交通网、通信网等,它们常常是有计划设计的,有明确的中心节点和边界,且连接方式也更接近于人工织物。当然,欧蒂斯(Laura Otis)指出,过去几百年中,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通常将它们混用,尤其在维多利亚时期,人们用 web 指蜘蛛网,也指手工织品,而电报和铁路网的铺设则慢慢强化了人们对 network 的印象,提升了该词的使用频率。详见 L. Otis. *Networking: Communicating with Bodies and Machin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2001, p. 6.

②Davidson C. N. “Oedipa as Androgyne in Thomas Pynchon’s *The Crying of Lot 49*”,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1977, 18(1): 38-50.

③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1.

④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1.

⑤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译林出版社2102年版,第397页。

⑥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7.

⑦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18.

⑧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9、第13页。

⑨李荣睿:《空间化的时间:托马斯·品钦〈葡萄园〉的大众媒体记忆政治》,《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3期。

⑩Melley T. *Empire of Conspiracy: The Culture of Paranoia in Postwar Americ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2000, p. vii.

⑪Galloway A R, E Thacker.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7, p. 5.

态划分为集中式(centralized)、非集中式(decentralized)与分布式(distributed)三种基本的拓扑结构^①。集中式网络存在单一的中央枢纽,它连接着无数个径向节点(radial node)或卫星节点(satellite node),这些节点之间互不相连;非集中式网络有多个中央枢纽,这些枢纽相互连接,彼此又各有多个不相连的卫星节点^②。品钦笔下的电视与广播系统属于集中式或非集中式网络,它们传播着受到中央调控的节目,将信息从中央枢纽传送至被动的个体接收者。奥狄芭的孤立隔绝状态与她对“从外面进来侵害她的力量”的恐惧^③,体现出个体在媒介环境下面临能动性威胁的真实写照,每一次使用媒介均意味着被卷入技术网络中,现代传播媒介本质上就是一种技术控制的工具。

当奥狄芭开始整理尹维拉雷蒂的遗产时,她发现这张控制之网远不止于媒介层面。尹维拉雷蒂的商业版图遍布整个湾区,从军工厂到房地产,从剧院到养老院,形成一个庞大的资本网络,其触角无处不在。事实上,整部小说的叙事动力就是奥狄芭试图对这个她身陷其中的系统进行“认知测绘”(cognitive mapping),她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最后惊奇地发现它们都是尹维拉雷蒂的资产。她展开圣纳西索的地图,绝望地发现该市的“整个商业中心区,包括扎普夫的书店……都是皮尔斯的产业。不仅如此,连坦戈拉戏院也是他的”^④。她意识到,自己追踪的每一条关于特里斯特罗的线索,最后兜兜转转总是能回溯到尹维拉雷蒂的产业。这张资本之网如影随形,形成一种神经质的紧绷感和无法逃脱的感觉,奥狄芭无论怎么蹦跶,最终都会落回尹维拉雷蒂设定的轨道中。她的恐慌不是针对某个具体的“敌人”,而是源于一个庞大的系统,其相互连接的规模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这是个体在无远弗届的网络结构面前感受到的深刻危机。

如果说尹维拉雷蒂的资本帝国展现的是一张在当下盘根错节的横向空间网络,那么在追查一批伪造的邮票时,奥狄芭则被迫将目光投向了网络的纵向历史深处,深入探究其权力根源。她了解到,从文艺复兴晚期开始,一个名为“图恩和塔克西斯”(Thurn and Taxis)的家族便垄断了欧洲的邮政系统,建立起一个庞大高效且绝对中心化的信息帝国。正如加戈达(Patrick Jagoda)指出的,现代通信网络的雏形与“一个新兴的帝国世界体系”紧密相连^⑤,这段探索经历让奥狄芭领悟到一个残酷的真相——“谁控制了通信网络,谁就控制了欧洲大陆”^⑥。媒介技术在信息传输载体之外还存在权力控制这一重本质,控制是网络与生俱来的内在属性,只是其具体形态随着历史不断演变。

至此,小说将现代的大众媒介、资本帝国和历史上的邮政通信网络并置与交错,最终为网络描摹出一幅跨越时空的宏大图谱,揭示了网络控制并非新生事物,而是贯穿现代历史的、不断演化的权力逻辑本质。从根本上说,通信与传播网络就是一种控制系统。正如战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的控制论(Cybernetics)强调的,对信息传递与反馈的有效管理即是控制的核心^⑦。无论是依靠信使还是电子信号,网络形态好比一部无生命的机器,根本作用在于整合分散的部件,使它们成为一个高效运作的系统性整体。品钦描绘的庞大网络以其控制性构成了小说网络想象中压倒性的一面,而正是在这张权力之网的重压下,对裂隙的寻找与对另类网络可能性的探寻,开启了网络想象的另一重维度。

二、反控制：“蜘蛛网”与“渔网”的对抗

无形的控制网络催生了奥狄芭偏执症(paranoia)的心理状态。在梅利(Timothy Melley)看来,这并非孤立的病症,而是一种广泛的战后文化现象,根植于人们“对技术、社会组织和通信系统可能削弱人类自主性的普遍焦虑”^⑧。然而,品钦在小说中并未将奥狄芭的偏执症处理为纯粹的病理症候,而是展

①Galloway A R, E Thacker.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7, p. 32.

②Galloway A 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11.

③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2.

④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40.

⑤Jagoda P. *Network Aesthetics*. Chicago and London: U of Chicago P, 2016, p. 9.

⑥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35.

⑦N·维纳:《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和社会》,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8页。

⑧Melley T. *Empire of Conspiracy: The Culture of Paranoia in Postwar America*.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P, 2000, p. 7.

现了深刻的辩证性:偏执症既是控制网络施加于个体的精神创伤,又悖论式地成为一种另类的认知工具。埃利亚斯(Amy J. Elias)认为,在品钦的作品中,偏执症是具有创造性的,“它既是一种能够揭露极权控制的阐释学……又反过来是一种开放的、多声部的、能够让人看到连接、联想和创造性差异的方式”^①。奥狄芭怀疑一切并在万物中寻找关联的偏执倾向,使她在为尹维拉雷蒂整理遗产的过程中得以穿透现实表象,感知到资本网络之外其他形式的连接。因此,她既是技术控制之网的受害者,又凭借创伤赋予她的敏感性,成为其他的网络形态,尤其是反抗之网“特里斯特罗”的潜在解密者。

在整理遗产的过程中,奥狄芭偶然发现了特里斯特罗地下邮政网络的存在。无数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边缘人“故意不用美国官方邮政沟通信息”^②,他们自愿从主流生活中退隐,使用一个名为W.A.S.T.E.的秘密通信系统。纽约戴恩公司的员工们每日用它匿名通信,不为传递实质内容,仅为维持互连网络的存在。这个地下邮政网络没有发出指令的中央控制站,不同身份的人如散落的碎片般自发地连接在一起——被迫放弃发明的工程师、同性恋酒吧的顾客、无名恋爱者协会的成员、唐人街上的药草商、夜里梦游的孩子、流亡的无政府主义者、破相的焊工、举行流产仪式的妇女等,他们构成了一张张无中心、非统一的多元异质网络,其节点可以随时切断或重连,却不影响网络的整体存续。

从拓扑结构上看,网络形态与权力机制之间其实并无天然的联盟。网络本身是一种灵活的结构,它既可以被构建成等级森严、垂直封闭的控制体系,也可以成为促进横向开放与连接的解放力量。小说中的地下邮政系统特里斯特罗显然有别于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介,它在结构上对应着加洛韦所说的分布式网络。与带有层级色彩的集中式和非集中式网络(类似于树干与树枝组成的树型结构)相比,分布式网络不存在任何中央枢纽或关键的径向节点,其中的每一个节点都是一个“自治的能动者”,并且能够与其他众多节点直接相连^③。这种结构在功能上与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迦塔里(Félix Guattari)提出的“块茎”(rhizome)概念极为相似,它是一种无中心、非等级、不断蔓延和变化的连接体。

然而,网络的政治属性也并非由其拓扑结构简单决定。一个分布式网络也完全可以成为控制的工具,小说中的公路网络便是绝佳的例证。高速公路网络在拓扑上是分布式的,理论上任何两个节点(城市或地点)之间都存在多条连接路径。但这个网络的建设是由上而下的,由国家或大型机构规划和实施。奥狄芭敏锐地感知到高速公路的暴力性,它强行规划土地,甚至让亡灵的安息之地为之搬迁,她想象道:“仿佛原来蒲公英的坟地还存在,坟地上你还可以散散步,不需要圣纳西索高速公路,人骨还可以在那儿安息,喂养蒲公英的幽灵,并没有人把它们翻掉。”^④圣纳西索高速公路将权力和暴力铭刻在它的修建过程中,因此尽管其结构是分布式的,但内在逻辑却是由上而下的控制。

我们今天所处的互联网时代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尽管互联网是一个典型的分布式系统,但控制无处不在。加洛韦在其著作《协议:去中心化后控制如何存在》(*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中指出,去中心化并不意味着网络中的控制消失,只是转化为“协议”的形式^⑤。协议不仅是纯粹的技术标准(如TCP/IP和DNS),更是一种全新的“管理风格”。它通过管控人们对“特定技术的接受、采纳和实践”^⑥,无需中央枢纽便可实现无形的治理。这种治理模式,在加洛韦看来,正是德勒兹构想的“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的实现机制,它已超越了福柯的“规训社会”(societies of discipline)。规训权力在封闭空间中塑造完整的“个体”(individual),而协议控制则通过代码、密码和数据流动来“调制”。在此新模式下,主体不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身份,而是被转变为“分割体”(dividuals),即可以被任意分割、筛选和编码的数据样本^⑦。这种控制被德勒兹比喻为“毒蛇盘圈”^⑧,以

^①Elias A J. “History.”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omas Pynchon*. Eds. I H Dalsgaard, L Herman, B McH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2, p. 126.

^②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41.

^③Galloway A 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 11.

^④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79.

^⑤Galloway A 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 8.

^⑥Galloway A 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 7.

^⑦Galloway A 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2004, p. 12, 86.

^⑧Deleuze G. “Postscript on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October*, 1992(59): 3-7.

一种更为隐蔽和无孔不入的方式渗透与运作。

那么,同为分布式网络的特里斯特罗为何能导向解放呢?答案在于它所采用的由下而上、自发涌现的组织方式。这类网络并非由权威中心设计,而是从众多自治节点的互动中“涌现”而出。特里斯特罗没有总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它的存在依赖于无数个体自发的、秘密的通信行为。这种由下而上的网络构建方式赋予了个体真正的能动性,每个参与者既是信息的使用者,也是网络的构建者,共同形成一个“非组织的组织”。它的力量不在于集中的命令,而在于流动性、适应性和不可预测性。这与协议化、由上而下控制的公路网或互联网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见,决定一个网络是导向控制还是解放的关键,并非其连接点的几何排布,而是构建和维系这些连接的权力关系与运作协议。

因此,品钦对 W.A.S.T.E. 地下邮政系统的构想,其深刻性不在于预言了未来互联网的某些技术特征,而在于它展现了在无所不包的联网社会中反抗力量存在的可能形式。任何网络结构,除了节点(node)与边(edge)之外,必然包含着第三个元素:空隙或网眼。这些固有的裂缝,使得全然悲观的态度变得不再必要。不少理论家提出,反抗并非要摧毁网络,而是要利用这些结构性的漏洞。加洛韦与萨克将这种策略称为“漏洞利用”(exploit),即“通过发现现有技术中的漏洞并经由这些漏洞投射出潜在的改变”^①。同样,贝伊(Hakim Bey)也相信,在主流网络(the Net)内部必然会“产生一种隐秘的反网络(counter-Net)”,它们“穿梭于网络的间隙和裂缝中”,形成对网络的“秘密与非法的反叛性使用”^②。特里斯特罗正是一种典型的“反网络”,它在数百年的漫长历史中始终以伪造邮票、扰乱官方邮路等游击战术,颠覆官方权力的统一秩序,它将邮筒伪装成垃圾箱放在高速公路边,上面刻着的 WASTE 字样需要仔细辨别才能看见字母间的黑点。品钦赋予它临时、游牧、无从界定等神秘特点,将它塑造为寄生在官方主流系统上的反力量,如黑客或病毒破坏行为一般寻找漏洞,主动地、暴力地篡改与颠覆官方系统的正常功能。这种抵抗模式可以被视为一种“反协议”(counterprotocol)的实践,它并不旨在摧毁网络,而是“在协议内部进行战术性的滥用”,从而识别出网络中的“政治性裂隙”^③。

在万物互联的全球化时代,由万维网和全球金融系统等协议化力量所编织的宏大网络,似乎正固化为一张无所不包的 control 天网,个体在其中无处可逃。但透过品钦的小说可以看到,即便是在如此严密的系统中,那些由下而上涌现的小型网络依然能够构成一种“反网络”,从而开辟出抵抗的空间(譬如,现实世界中的 P2P 文件共享网络、开源软件社区、黑客行动主义团体等)。奥狄芭在小说中观察到的“无政府主义的奇迹”——例如聋哑人群的舞蹈——就是对这种自发形成的共同体的畅想。凯利(Kevin Kelly)曾指出,当一个分布式系统的秩序不是源于自上而下的命令,而是从底层无数个体的简单互动中涌现出来时,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控制着整个群体”^④,这样的群体奇迹就类似于“蜂群思维”(hivemind)。在蜂群模式中,群体展现出超越任何单个成员智慧的集体智能,这种智能并非来自某个首领,而是来自成千上万个体的相互作用。同样,鸟群在飞行时,没有领头的鸟发出指令,每只鸟都只是遵循着几条简单的本能规则——与旁边的几只鸟保持合适的距离,并调整自己的速度与方向(也即“自适应”),最终,“群态从这样一群罔顾其群体形状、大小或队列的生物中涌现出来”^⑤。小说中聋哑人的群舞也生动地再现了这样的“无政府主义的奇迹”。一群聋哑人在沉默中各自跳自己喜欢的舞:“探戈、两拍子圆舞、桑巴舞、布鲁斯舞”,奥狄芭期待他们会因缺乏统一指令而相互碰撞,陷入混乱,但他们却奇迹般地从未相撞。舞者们保持着“神秘的一致性”,“仿佛自己头脑里有音乐一样”^⑥。他们没有共享同一个大脑,却形成了一个临时的“蜂群”。每一个舞者都是一个自治的节点,通过观察身边舞者的动态微调自己的舞步。这种基于局部感知的持续互动,最终涌现出的集体秩序“不是基于排他性、趋同性”,而是“每个‘异在’都完整

①Galloway A R, E Thacker.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7, p.81.

②Bey H. T.A.Z.: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New York: Pacific Publishing Studio, 2011, p. 75.

③Galloway A R, E Thacker. *The Exploit: A Theory of Networks*. Minneapolis: U of Minnesota P, 2007, pp. 30-31.

④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1 页。

⑤凯文·凯利:《失控——全人类的最终命运和结局》,张行舟、陈新武、王钦等译,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7 页。

⑥Pynchon T. *The Crying of Lot 49*.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6, p. 107.

保留自身的特殊性‘和而不同’地共存”^①。这就是凯利描述的“失控”的力量:一种源于底层的、分布式的、无领导的合作,它不依赖于任何中央权威,却能创造出最复杂、最和谐共同体形式。

由此可见,《拍卖第49批》中的网络想象呈现出复调的结构:一边是无所不包的从大众媒介技术到尹维拉雷蒂的资本帝国的集中式巨型网络,另一边是以特里斯特罗为代表的、由边缘群体自发构成的局部微型网络。我们可以借用贝伊提出的一对绝妙的隐喻来区分这两种网络:如果说官方的、控制性的媒介—资本网络是“渔网”(fishing-net),那么地下的、反抗性的特里斯特罗网络就是“蜘蛛网”(spider-web)^②。渔网被设计用于捕捞和围猎,它具有总体性和统摄性,试图将一切纳入其规整的网格之中。而蜘蛛网则完全不同,它规模更小也更灵活,被“编织在渔网的网格之间和破损之处”^③,见缝插针地出现在被忽视的罅隙中,以游击战术发起攻击,一旦被发现镇压就消失,然后去别处安营扎寨。至此,奥狄芭的旅程完成了象征性的转变。她从开篇那个被动地困于“渔网”之中、身份模糊的“被编织者”,转变为一个主动追寻“蜘蛛网”线索、试图理解其复杂图案的“编织者”。品钦笔下这两种网络的冲突与博弈,不仅预演了数字时代复杂的权力斗争,更通过奥狄芭的探险历程,揭示了网络与生俱来的双重潜能,它既能作为权力的同谋将人们囚禁,也能成为个体反抗并重塑意义的阵地。

结语

20世纪60年代见证了网络意识的兴起,它既是前沿思想家们重构世界图景的隐喻,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变为技术现实。品钦的《拍卖第49批》艺术性地呈现了这一时代深处的观念潜流。在小说复杂的网络生态中,大众媒介技术与资本帝国交织成控制之网,将普通人笼罩其中,但天罗地网内在的“漏洞”与罅隙也为反抗开辟了空间。地下邮政系统特里斯特罗从历史上存续至今,代表着边缘群体利用网络的缝隙,构建出寄生于或隐匿于主流巨网之上的“反网络”,这些自下而上、去中心化的微型社群展现了网络作为乌托邦想象的解放维度。因此,品钦的超前之处不仅在于“预言”了互联网的诞生,更在于他深刻地洞察到,网络形态内嵌着控制与反控制的辩证关系。《拍卖第49批》的网络想象穿透了历史,在数字技术日益渗透生活的今天,它依旧启发我们去追问:网络究竟是解放个体的赋权工具,还是更为精密的控制模式?它提示我们,这并非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两者永恒共存的斗争场域。

Network Imaginaries in *The Crying of Lot 49*

JIANG Yi

(School of Foreign Studies, Jiangnan University, Wuxi 214122, China)

Abstract: Thomas Pynchon's *The Crying of Lot 49* dialectically presents the internal tensions embedded within network structures through envisioning different forms of networks. The novel juxtaposes and interconnects mass media, the capitalist empire, and historical postal systems to reveal that the essence of network control is not a nascent phenomenon, but rather an evolving logic of power that runs through the modern history. At the same time, the novel also uncovers the inherent counter-control potential within network structures: marginalized groups utilize the holes in the macro-network to construct “counter-networks” that exist parasitically upon or hidden within it. The dialectical tensions between these two network imaginaries not only reflect Pynchon's foresight into the complexity of networks before the advent of the Internet age, but also offer profound insights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of power within our own networked societies.

Key words: network; Thomas Pynchon; *The Crying of Lot 49*; mass media; societies of control

(责任校对 朱正余)

①但汉松:《“卡尔”的鬼魂问题——论品钦〈秘密融合〉中的共同体和他者》,《当代外国文学》2015年第4期。

②Bey H. T.A.Z.: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New York: Pacific Publishing Studio, 2011, p.75.

③Bey H. T.A.Z.: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New York: Pacific Publishing Studio, 2011, p.75.